

典故、形式與譬喻

——從「南枝」論詩歌新語詞的生成

朱 先 敏*

提 要

詩歌新語詞研究的既有成果在於語詞生成後的衍義情況，以及語詞和文化互動的過程，少見對於語詞如何生成、為何生成的討論。本文以「南枝」一詞為例，考察漢末〈行行重行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起，經六朝、至唐代詩人對此一新語詞的運用情況。從典故用事、詩歌體式、譬喻生成等三個面向挖掘南枝為詩人持續運用並能生成衍生義的原因。詩人藉由詩歌創作的實踐，讓詩作成為語詞生成新意的實驗場地。本文試圖彰顯詩人創作時的創意和選詞對新語詞生成的有效性，並藉此討論語詞生成與詩歌體式、文學意象等議題：包括共識性的意象如何疊加在成辭上，並形成新的典故；詩歌句式和修辭彼此影響、不斷更新的動態過程；以及譬喻意涵如何隨著詩人慧心和歷史、政治的互動不斷增生。經由對詩人創作意識的凸顯以及對重要詩學議題的回應，詩歌新語詞的討論或可成為詩歌史研究的關鍵。

關鍵詞：詞彙化、詩歌、新語詞、譬喻

Allusion, Form, and Metaphor:

Lexicalization of a Poetic Term “*Nan-Qi*”

Chu Hsien-min*

Abstract

The studies of new terms in poetry has focused on how the meaning changed after a word is lexicalized, and how a new term interacted with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why, and how is the particular word that became a new term during the writing process. In the case of “*Nan-Qi*”, since this term have used in a poem in late East-Han, many poets used it as an allusion. Moreover, they used it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need of the mainstream of the poetic form in the era. From time to time, “*Nan-Qi*” becomes a complicated metaphor. Hence, the using of “*Nan-Qi*” involves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lyric poetry.

Keywords: lexicalization, poetry in medieval China, metaphor

*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典故、形式與譬喻

——從「南枝」論詩歌新語詞的生成

朱 先 敏

一、前言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以胡馬、越鳥和南枝三個新語詞，與《詩經》以來既有的詞彙北風組成對句，以眷戀故土之物類反襯遠行人久久不歸的薄情。六朝詩人則沿用「南枝」典故書寫鄉思，如「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予起南枝怨，子結北風愁」。¹ 唐代詩人進一步以南枝直接指稱家鄉、並以向南樹枝暗示思鄉之情。南枝歷時的變化呈現了詩歌新語詞的生成過程，也就是詩歌創作中偶發的詞組逐漸形成有共識的語義，再形成衍生義的現象。原詩對句中的四個語詞胡馬、北風、越鳥和南枝在六朝到唐代的詩作中逐漸演變成三種不同的運用情況：從《詩經》開始就出現在文獻中的北風成為環境嚴峻的象徵；胡馬和越鳥僅被後代詩人依循原詩南北對舉的架構選用；而南枝則能夠獨立於對句結構之外表達家鄉的衍生意涵。詩人對於語詞的揀擇凸顯了南枝一詞的獨特性。此外，原詩中北風和南枝都是家

¹ 晉·潘岳〈在懷縣作詩〉二首之一、梁·何遜〈送韋司馬別詩〉，收入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634、頁1687。

鄉代指，但後世詩人並未以北風借代家鄉，北風也未能衍生出家鄉的詞義。上述兩個現象顯示出詩人創發的詞組南枝其實暗合了時人對家鄉的想像，詩歌新語詞的生成並非偶然。²

新語詞和「詞彙化」的討論密切相關，而語言學界對於詞彙化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詞彙化指的是詞組隨著應用逐漸符合詞彙標準的過程。³ 承接此一定義繼續進行的研究雖然不少，但語言學家的研究興趣在於探討一次性的字詞組合，如何逐漸演變成語義固定、運用廣泛的詞彙。⁴ 換言之，其研究成果主要著力於辨析個別複音詞的詞彙化過程，而非探討單一詞彙能夠詞彙化的原因。因此，詞彙化研究的貢獻在於根據語料分析詞組何時成為詞彙，成詞後的語義又有什麼變化。⁵ 詞彙學歸納了成詞過程的完整圖像，但較少觸及「為何特定詞組能詞彙化」的討論。此外，成為詞彙的標準必須受到是否收入辭典、

² 在討論「南枝」一詞在詩歌中的運用狀況時，「東南枝」如何和「南枝」區分也需要處理。就詞彙學的角度，雙音詞南枝和三音詞東南枝已是兩個不同的語詞，生成原因和結構都不一樣。就詩歌的角度來看，東南枝在唐前詩作僅〈孔雀東南飛〉一例、唐詩僅二例，並未形成詩人常用的語詞，同時也沒有衍生的抽象語義。東南枝多用於醫方典籍，或許與其具有某種玄妙性有關。《甄異傳》修訂了古人傳說「亡者畏桃」的說法，以鬼魂親身實證說明僅有「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才讓死者感到厭憎。而《北史》則記載了陳留地區的俗諺：「待枯栢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此事後來驗於隋文帝楊堅身上。記載柏樹、桃樹、白楊、槐樹等樹種的東南枝療效的醫方多為唐人著作，或許與上述兩件事有關。「亡者畏桃」參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菓部上·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86，頁1470。「陳留俗諺」參唐·李延壽撰：《北史·列傳二十三》（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35，頁1296。

³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與發展》（修訂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2-3。

⁴ 舉例來說，紅衣女郎和白衣天使的組成結構完全相同，但前者指稱的是一次性的對象，在這個語境外，紅衣女郎不具有特別的意義，也可以被替換成黑衣、綠衣、黃衣。然而後者指稱的是護士，因此白衣不能被其他顏色取代、天使也不能改成惡魔，如果寫作黑衣惡魔，就和護士毫無關係了。由上述兩個詞的對比可知，紅衣女郎是詞組，而白衣天使是詞彙。

⁵ 王雲路：《中古漢語詞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81-94。

進入日常語言等條件判定，⁶ 故多以日常語言為材料。然而，詩歌新語詞不見得會成為日常語言，因而需要在既有研究成果之外另行討論。由於詞彙化的定義並不僅限於「成詞」與否，凡是在語言使用過程逐漸加深詞彙化程度的詞組，都體現了詞彙化的不同階段。⁷ 由此可見，選擇並未進入日常語言的詩歌短語進行討論，正可補充詞彙化研究的不同面向。

語言學研究以詞彙化理論解讀詞彙的生成與衍義，詩歌研究對於新語詞的討論則集中於如何考釋古典詞彙、為詩歌尋求真義；⁸ 或者如蔣英豪、鄭毓瑜視新語詞為媒介，探討詩歌創作如何反映時代變遷對詩人思考、書寫與表達的影響。⁹ 趙曉馳、周尚義則統整、解讀詩人的自鑄新詞，剖析個別詩人的創作意識。¹⁰ 另外，楊玉成藉由陶淵明詩的時間用語探討中古詩人的時間觀，以詞語的運用凸顯時人的普遍觀念，其中所討論的語詞雖然以前有所承的單音詞為主，卻證明了詞義的繼承或新生都需要時人共識。¹¹

⁶ 如註3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與發展》（修訂本）所分析的語料皆為日常語言，並未討論僅見於文學作品的語詞。

⁷ 同註3，頁3。

⁸ 如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年）對唐詩中運用的詞彙進行全面性的討論；又如單篇論文中針對某幾個詞義進行說解，如周俊勛，朱慶之：〈中古漢語詞義研究札記〉，《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2卷第4期（2011年7月），頁14-17。

⁹ 蔣英豪：〈日本雜事詩與近代漢語新詞〉，《漢學研究》第22卷第1期（2004年6月），頁299-323；〈梁啟超與近代漢語新詞〉，《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3卷第44期（2004年），頁379-404；鄭毓瑜：〈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的典故運用為例〉，《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頁251-292。

¹⁰ 參趙曉馳：〈王維詩歌顏色詞義研究〉，《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2007年10月），頁76-80；周尚義：〈閒人、閒居與閒味——白居易閒適詩語詞的文化解讀〉，《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5期（2006年9月），頁33-36。

¹¹ 楊玉成：〈詩與時：陶詩與中古時間詞語〉，《東華漢學》2010年第11期（2010年6月），頁29-121。

藉由分析南枝逐漸成為詩歌新語詞的過程，本文嘗試回答影響詩歌新語詞生成和衍義的主要因素。首先探討六朝到唐代詩人如何運用南枝，探析它被置放的語境、詩人如何回應原詩的典故、新語詞與詩歌體式的互動關係。這將有助於探究南枝為何特別受到詩人偏愛，這樣的傾向不僅呼應情感需求，也應該是文學形式上的考量。其次，南枝一詞所激起的聯想與感知背後，必然有引發的理路和脈絡。藉由六朝與唐人的風土感知、歷史文化與社會情境，探究「南方」與「樹枝」這兩個概念如何疊加成詩人對家鄉的懷想與眷戀，更進一步形成不同詩人筆下共通的思鄉意象。「南枝」雖然只是新語詞生成的一個例子，但藉由新語詞與典故、體式、譬喻等關聯性的討論，將能夠照見詩歌新語詞研究對詩歌發展史的影響。

二、典故與形式：南枝的家鄉衍生義

《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這組對偶句，是「南枝」首見於文獻的材料。一個由「南」和「枝」組成的新語詞，與胡馬、北風、越鳥形成南北對舉的結構：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漢詩卷12）

在這首描述丈夫遠行不歸的閨怨詩作中，詩人以北風和南枝作為家鄉的替代，而異地遊子則被比擬為胡馬和越鳥，以動物對原鄉的渴盼之情反襯出外不歸的夫君。「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接續在道阻且長、不知何時能夠相會的喟嘆

之後，除了凸顯胡馬依北、越鳥思南的畫面感，更襯托思婦渴望與丈夫重聚的落空。

「南枝」在〈行行重行行〉中是閨閣怨情的陪襯和背景，而當它作為古詩典故再次被詩人化用時，便纏繞上思念而不得的重量。晉代潘岳〈在懷縣作詩〉「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晉詩卷 4）沿用「越鳥巢南枝」的成辭舊典，卻擺脫了原詩相互對仗的形式，也不再拘泥並舉身處南、北的異鄉騷客渴望親近家鄉方位的格套。潘岳單獨拈出越鳥與南枝重新造句，挪借古詩典故指稱自己的家鄉。詩作無需鋪排詩人與南方的親近關係，因為南枝不再只作為南方的替身，而是不論原鄉地域、人人皆可以想像和寄託的家鄉。「越鳥巢南枝」是以南枝作為無法返鄉的替代，越鳥築巢於枝上是因為想親近南枝朝向的南方，而非那一桿向南的樹枝。而「眷戀想南枝」中的南枝直接就是越鳥懷想的對象，「巢」與「想」之間一個字的抽換，說明南枝在此處已成了「家鄉」本身，因此越鳥並不築巢其上，而是對其眷戀懷想。

潘岳的詩作顯示出南枝從家鄉替身成為家鄉代稱，而梁代何遜的〈送韋司馬別詩〉則進一步將南枝抽象化，用來修飾新的詞組「南枝怨」：「予起南枝怨，子結北風愁」（梁詩卷 8）這兩句顯示出南枝脫離了越鳥，構成新詞組與北風愁相對，用以借指別離相思。雖然南枝與北風同樣脫胎自〈行行重行行〉，但南枝怨一詞將南枝轉品為形容詞，與怨重新結合成新詞組。這在語言學上被稱為詞彙化的詞性標準，¹² 當一個詞組能夠被以不同詞性靈活化用，說明組成詞組的兩個單音詞彼此之間的關係更穩固、詞義也更明確。可見在何遜所處的時代，南枝是一個相當普及的語詞，因此可以用來修飾離別怨情，南枝之怨因而呈現出比「向南樹枝」更抽象的詞義，也就是離別相思。

¹² 王雲路將成詞標準歸納為使用頻率、詞性標準、詞義標準、構詞標準和音節標準，參氏著：《中古漢語詞彙史》，同註 5，頁 81-94。

潘、何詩作在全篇鋪陳上並未強調南枝的地理性，這並非出於偶然，同樣的鋪陳方式也出現在辭賦中。如陸機〈懷土賦〉「愍栖鳥於南枝，悼離禽於別山」，離禽和別山以離、別二字點出人在異地的現象，與之相對的栖鳥和南枝卻不需要說明南方之於栖鳥的陌異感。而陸雲〈愁霖賦〉「結南枝之舊思，詠莊舄之遺音」則將南枝與鄉音並舉，表達留戀故土之情。¹³ 〈懷土賦〉化用鳥棲樹枝的意象、〈愁霖賦〉則標舉「南方」統合了南枝、越音兩個不同的典故。這顯示出南枝逐漸脫離原詩架構的發展軌跡在詩歌和辭賦兩類文體上是相似的。二陸兄弟自江東入洛，深受南北傾軋之苦。¹⁴ 讀其懷鄉之作，不免心生南土之悲。然而，陸機〈懷土賦〉雖然於序中明言「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是為思鄉而作，然而下文卻強調「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文中所述皆為當下所見所聞，並未由現居地連接到家鄉，或以此興發南北差異。而陸雲〈愁霖賦〉為應酬之作，蓋因鄴都大雨而「時文雅之士，煥然竝作，同僚見命，乃作賦」。《全後漢文》、《全三國文》亦收入應瑒、曹丕、曹植的同題之作。¹⁵ 比較諸篇，唯有陸雲寫及思鄉之情，在兩停之後所作〈喜霽賦〉，亦有的「夷中原之多潦兮，反高岸于嵩岑」的句子，凸顯出作為京師異鄉人的他者眼光。然而無論陸機或陸雲的作品，除「南枝」一詞帶了南字之外，其餘文句皆未強調南北之別。選用南枝一詞，與其說是藉其地理性質指涉南方

¹³ 晉·陸機：〈懷土賦〉，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人部十·言志》，卷 26，同註 2，頁 474；晉·陸雲：〈愁霖賦〉，清·嚴可均校輯：《全晉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卷 100，頁 2032。

¹⁴ 陸機入洛後受北方士人歧視，《世說新語》有數例，如「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參南朝宋·劉義慶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 年），頁 88。林文月在分析潘岳、陸機詩作時，曾引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詩〉說明潘岳對吳國的冷漠、鄙夷，可見南北傾軋之盛。參林文月：〈潘岳陸機詩的南方意識〉，《臺大中文學報》1992 年第 5 期（1992 年 6 月），頁 18。

¹⁵ 清·嚴可均校輯：《全後漢文》，卷 42，同註 13，頁 699；《全三國文》，卷 75，同註 13，頁 1072、1122。

家鄉，不如說他們的身世之感使其引據舊典時傾向以南枝而非北風來代稱。

接續六朝詩人在運用舊典的創意和突破，唐代詩人將南枝作為形容詞修飾其他語詞的手法更為豐富而純熟，比如在駱賓王〈望鄉夕泛〉以繞南枝的鵲鳥比擬為思鄉客子：

歸懷剩不安，促榜犯風瀾。落宿含樓近，浮月帶江寒。

喜逐行前至，憂從望裏寬。今夜南枝鵲，應無繞樹難。¹⁶

詩末以「今夜南枝鵲，應無繞樹難」作結，繞樹的鵲鳥讓人聯想起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的意象。然而〈短歌行〉以無枝可依的鵲鳥比喻求明主不可得的賢才，而駱賓王詩裡的南枝鵲指稱的卻是異鄉遊子，這顯示了詩人在運用典故成辭時內涵的複雜性。全詩並沒有南北風土的對比，可見此處的南枝並未指涉地理方位，或試圖以此暗示駱賓王是身居北域、心懷南土的南方人，而是以「南枝鵲」比喻思鄉的自己。詩人預設讀者能夠以南枝借指家鄉，而不會單純解讀為向南樹枝。此處的南枝鵲和〈送韋司馬別詩〉的南枝怨有所不同，後者需要以北風愁作為對舉，共同指涉詩人借用的典故；前者則可以直接指稱返鄉人，顯示出南枝的家鄉義已逐漸成為詩人與讀者之間的共識。深感繞樹之難的鵲鳥暗示的是無枝可依的悽惶，而通過「南枝」一詞的共識又新添了「越鳥巢南」的思鄉想望，令詩歌的意蘊富含多重層次，也凸顯了自〈行行重行行〉以降，表達懷鄉時具有歷史厚度的陳述方式。

唐代詩歌將南枝與其他語詞結合成新詞組的詩句，尚有「笑向南枝花」、「夜夜南枝鳥」、「生計南枝鳥」、「獨結南枝恨」等。¹⁷ 多元的新詞組讓詩人

¹⁶ 清·曹寅，彭定求等編，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78，頁841。

¹⁷ 唐·獨孤及〈傷春懷歸〉「思歸吾誰訴，笑向南枝花」、元稹〈憶雲之〉「萬里瀟湘魂，夜夜南枝鳥」、白居易〈西樓夜〉「年光東流水，生計南枝鳥」、皇甫冉〈送從

得以疊加更豐厚且富有詩意的表現形式，南枝枝頭上新綻的花蕾、夜夜徘徊於南枝旁的鷓鴣都成為詩人能憑依故鄉之思的寄託，甚至以南枝恨作為一種情感類型，將舊有典故中「鳥一樹」的連接潛藏其下。與此相較，雖然潘岳詩中亦有「越鳥志」一詞，但此後沒有被其他詩人繼續沿用。越鳥雖然也可以與其他語詞連用形成三音詞，但多用於代指南方，指涉明確的地理方位，如劉長卿〈初聞貶謫，續喜量移，登干越亭贈鄭校書〉「越鳥豈知南國遠，江花獨向北人愁」、李白〈同王昌齡送族弟襄歸桂陽二首〉「覺來欲往心悠然，魂隨越鳥飛南天」等。詩題多有送人南歸、赴閩、嶺南等語詞，詩句中的越鳥則多與巴猿、蜀地、吳人等語詞連用，可見這些唐人詩歌回應的仍然是原詩試圖以南北對舉彰顯的地理指涉，與南枝逐漸脫離地理實指、轉而抽象地抒發情感的衍生語義不同。

南枝的家鄉義在唐代的懷鄉詩與送別詩體現得更為深刻，因而生發了更豐富的表現形式。唐詩中的南枝讓詩人用以懷想、持贈、觀看，再進而引發思鄉情懷，比如獨孤及〈傷春懷歸〉「思歸吾誰訴，笑向南枝花」（卷 246）、儲嗣宗〈早春〉「踟躕曆陽道，鄉思滿南枝」（卷 594）、方乾〈送葉秀才赴舉兼呈呂少監〉「樽盡離人看北斗，月寒驚鷓遶南枝」（卷 650）。元淳〈寄洛中諸姊〉以詩人朝向南枝流淚的身體動作，顯示出即使詩中沒有其他暗示〈行行重行行〉的語詞，不必借用典故仍然可以寄託思鄉之情，解消以南枝一詞回應原詩實指南北方位的疑慮：

舊國經年別，關河萬里思。題詩憑雁翼，望月想蛾眉。

白髮愁偏覺，歸心夢獨知。誰堪離亂處，掩淚向南枝。（卷 805）

弟豫貶遠州）「獨結南枝恨，應思北雁行」，同前註，卷 246、卷 400、卷 443、卷 249。

元淳為唐代女道士，《全唐詩》稱其洛中人，「舊國」在唐詩中多指故鄉、關河則為洛陽代稱，因此〈寄洛中諸姐〉是從異地寫給家鄉的姐妹。¹⁸ 詩人因思念故土而朝著南枝落淚，雖然受限詩句和史料無從考證元淳此時身在何方，但將洛陽視為南方未免牽強，故此處的南枝並不表示詩人思念地理上的南方。「洛中」與「南枝」的矛盾，顯示出時人已不再將南枝解讀為向南樹枝，而是暗示著不論南北的家鄉所在。所以即便收信人身在洛陽，元淳卻依然可以對南枝垂淚。詩中以望月、掩淚帶動了全詩最具動感的兩處身體動作，因此綴續其後的蛾眉和南枝也因此成為表述思念擔憂之情的關鍵。南枝作為漢末才成形的新語詞，居然能與《詩經·碩人》、宋玉〈招魂〉所採用「蛾眉」一詞並舉，承載詩人思念家人和故土的綿延情意。¹⁹ 這顯示出南枝不僅僅是一個被取用的既有典故，更積累疊加了思婦欲會遠人、飛鳥思返南方、文人一心重回故土的憂思，以及詩歌代代沿用所形成的美感體驗。

詩人援引〈行行重行行〉的典故，借用既有的意象傳情達意，這樣的修辭手法憑藉的是作者與讀者之間共通的知識和表達情感的敘述方式。蔡英俊認為「『用事』指向了作家對於過往已定的事例的一種借代與解釋，並且著重在作家

¹⁸ 《全唐詩》記載「元淳，女道士，洛中人。存詩二首」，同前註，卷 805，頁 9158。「關河」為洛陽代稱見陳子昂〈諫靈駕入京書〉與吳兢〈諫畋獵表〉。陳子昂進諫崩於洛陽的高宗應就地建陵而非移靈入長安時，歷述洛陽美善，其中便有「東壓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嶠澗，據關河之寶」的句子。又如吳兢〈諫畋獵表〉「臣兢言，伏見明制。來年五月五日幸東都，道路皆以陛下至長春宮及沙苑，當有畋獵之事。今東土耆艾、關河士女，莫不欣躍舞抃，翹望帝車，延頸企踵。」吳兢是武周時人，此時東都指的是洛陽。文中以「東土、關河」借指洛陽，可見關河可代稱洛陽。參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 212，頁 2148-1、卷 298，3022-2。

¹⁹ 《毛詩·國風·衛·碩人》「螓首蛾眉」，參《斷句十三經經文》（臺北：開明書局，1991年），頁 15；先秦·宋玉：〈招魂〉，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文》，卷 10，同註 13，頁 77。

對於過往經驗的理解與認同」，²⁰ 指出「用事」並非單純源於作者個人情志的抒發，而是意圖彰顯語言文字的經營與知識背景的共享。但正是藉由他對用事在作者與讀者之間有效性的強調，可以得知詩人選用典故時試圖呈現的並不是個人的經驗，而是追求大多數人能夠理解和認同的感受。這證明了詩人對於南枝的偏好與傾向並非偶然隨機，而是詩人對集體共識的捕捉和把握。

《文心雕龍·事類》將援引典故分為兩種，一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另一種則是「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²¹ 最早沿用〈行行重行行〉舊典的「眷戀想南枝」和「予起南枝怨」都屬於「全引成辭」的作法。為什麼當六朝詩人引用〈行行重行行〉典故時選用成辭「南枝」，而非稽引古事再另創新詞？對於詩歌創作而言，「南枝」具有更適宜的效果嗎？

葛曉音指出，五言詩因為「每句語法意義可以獨立，缺乏四言體上下句之間天然的的依存關係，所以很容易形成單行散句」，²² 為了解決各句之間缺乏連接性、節奏感不強等問題，五言詩人嘗試以各種方法來黏著各個詩句。漢樂府到《古詩十九首》之間的五言詩歌呈現出運用連接詞、倚靠句意產生連貫性、排比對偶修辭和使用重言、聯綿字等方法來帶動節奏。²³ 潘岳和何遜雖然生於五言詩漸趨成熟的西晉、南朝，但他們連接單行散句的方法仍能看出早期五言詩的痕跡：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羲。

²⁰ 蔡英俊：〈「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收入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75。

²¹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頁614-615。

²² 葛曉音：《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292。

²³ 同前註，頁292-299。

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
涼颺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
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潘岳〈在懷縣作詩〉，晉詩卷4）

送別臨曲渚，征人慕前侶，離言雖欲繁，離思終無緒。
憫憫分手畢，蕭蕭行帆舉。舉帆越中流，望別上高樓。
予起南枝怨，子結北風愁。邈邈山蔽日，洶洶浪隱舟。
隱舟邈已遠，徘徊落日晚。歸衢並駕奔，別館空筵卷。
想子斂眉去，知予銜淚返。銜淚心依依，薄暮行人稀。
曖曖入塘港，蓬門已掩扉。簾中看月影，竹裏見螢飛，
螢飛飛不息，獨愁空轉側。北窗倒長簟，南鄰夜聞織。
棄置勿復陳，重陳長歎息。（何遜〈送韋司馬別詩〉，梁詩卷8）

潘岳「自」……「迄」、「徒懷」等連接詞的串連；何遜由「送別」到「帆舉」、舉帆遠颺到高樓送別、舟遠故而返家、返家見室空因而心生惆悵等藉由句意關聯與情思流蕩所營造的綿延感。對偶的句式更是一再被使用，還發展出重言與合意複音詞分別相對的對偶方式。²⁴ 如「憫憫」對「蕭蕭」、「芊芊」對「離離」、「斂眉」對「銜淚」、「靈圃」對「通衢」等。南枝在這兩首詩都屬於對偶句的組成結構，比如「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雖然不是一組工整對句，但「懷」映照的是「眷戀」、「想」，「越鳥」相對的是「南枝」，前者都是情感

²⁴ 朱先敏：《抒情與節奏——魏晉五言詩重言與聯綿字情態詮釋》（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鄭毓瑜先生指導，2014年），頁87-90。

勾連纏繞的動態、後者都是詩人懷鄉之情的承載與寄託。而在「予起南枝怨，子結北風愁」中，「予」和「子」、「起」對「結」、「南枝」對「北風」、「怨」對「愁」。越鳥和南枝不但暗示著詩人以古詩用事，同時也負擔著對句中一組對仗的位置，更藉此勾連出讀者共通的表情達意的形式、以及漂亮的駢偶呈現出的文學審美。

潘岳、何遜以南枝組成對偶句形構出五言詩的綿延感，其他六朝詩人也察覺到「南枝」一詞應對對偶需求的優勢。六朝詩作共有六首詩使用了南枝一詞，且都被用於對偶句。²⁵ 除了潘、何二人的作品外尚有四首詩分別以南枝對照「西壁」、「北戶」、「北堂」和「北風」。可見南枝的詞組結構和方位特性，讓它在重視對偶的漢魏五言詩中更具有被選用的優勢。與此相較，已經成詞的北風不但被用於各種文類，而且也不一定要在詩中組成對偶句，顯示出詩人運用時更大的自由度。如魏代曹植〈怨歌行〉「北風聲蕭蕭，烈烈入吾耳」、南朝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等。由此可見，南枝在〈行行重行行〉被組成新語詞後之所以能被繼續沿用，除了引用原詩典故召喚讀者既有知識和親切經驗外，南枝作為雙音合成詞的形式特徵也與積極組建對偶句以帶動五言詩節奏的創作需求一拍即合。

在組成對偶句的需求之外，五言詩的句法結構也影響了詩人對南枝一詞的偏好。葛曉音歸納出「凡用排比對偶句式的五言，大部份是二三節奏」的句式規則，因為這樣會使誦讀節奏較鮮明。而二三節奏中又以二一二節奏為主，因為它與既有的四言二二節奏最為合拍。²⁶ 因此，南枝作為雙音詞不但宜於對偶，而

²⁵ 梁·王僧孺〈秋閨怨詩〉「斜光隱西壁，暮雀上南枝」（梁詩卷 12）、蕭綱〈雙燕離〉「銜花落北戶，逐蝶上南枝」（梁詩卷 20）、陳·周弘正〈學中早起聽講詩〉「北堂月稍隱，南枝鶴已飛」（陳詩卷 2）、隋·楊素〈贈薛播州詩〉「君見南枝巢，應思北風路」（隋詩卷 4），同註 1，頁 1767、1915、2461、2678。

²⁶ 同註 22，頁 285-288。

且能靈活地置於二一二節奏中的句首、句末或與第三個字組成三音詞組，相當適合五言詩的句式結構。而趙敏俐認為四言詩到五言詩轉變的重要性在於詩人對於語言「準確性和生動性」的要求越來越高，具體的作為是善用五言詩多的一個詞位「盡量增加附加成分」描寫主語和謂語，並用雙音的賓語取代四言詩常用的單音代詞與虛詞。²⁷ 雖然其研究材料是以《二南》和《古詩十九首》做對比，但就南枝的發展來看，從六朝至唐代都服膺這樣的語言現象。比如唐代衍生出南枝鵲、南枝花、南枝鳥、南枝恨等新詞組，將南枝作為「附加成分」來描寫句子中的謂語。當讀者見到這些語詞時，自然能夠疊加上南枝所蘊含的典故意韻，使得花鳥不只是客觀的自然景觀，而暗示了離家遠行、思鄉殷切的遊子情懷，讓謂語的含義更加豐富深刻。而賓語的補入讓原本需要用兩句四言詩才能完成的語意濃縮在一句之內，使敘述得以更生動複雜。如元淳的「掩淚向南枝」一句內有「掩」和「向」兩個動作、分別對應「淚」和「枝」兩個受詞，再用「南」這個形容詞為樹枝添上古詩傳統與思鄉舊典。相對於「掩淚向南枝」的精練，如果將此句改寫作四言就必須以「之」代替南枝，將一句拆成兩句。可見五言詩補入賓語後所能描繪的生動情景是四言詩難以企及的。

三、有意為之的「偶然」：從地理指涉到家鄉衍義

「南枝」在六朝詩歌呈現出衍生詞義，而透過典故運用和詩歌體式的角度也能夠解釋詩人傾向於使用此一新語詞的原因。然而「南枝」不僅作為響應〈行行重行行〉的舊典，同時也獨占了原與北風並舉為例的家鄉詞義，這樣的現象應該與「南」與「枝」的字面意義有關。試圖證明南枝在詩歌運用上的特殊性，必

²⁷ 趙敏俐：〈四言詩與五言詩的句法結構與語言功能比較研究〉，《中州學刊》1996年第3期（1996年5月），頁88-89。

須比較胡馬、北風和越鳥等語詞如何被安放於詩歌語境，如此才能確定唯有南枝一詞能跳脫原詩以南北相對、指涉地理方位的表述方式，並藉由詩人不斷生發新意的語詞應用，逐漸能夠直接指稱家鄉、獨立衍義。

在漢末古詩對句中，「胡馬」、「越鳥」和「南枝」一樣是首次被結合的雙音詞組，但此後前兩者被運用的情況卻與南枝不大相同。越鳥的意義無法脫離思慕南方的印象，凡提及越鳥皆是指涉地理位置上的南方。比如《北齊書·文宣帝紀》記述北齊任梁國臣民返回南方的詔令時提到「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²⁸ 越鳥和梁民都是處於異地的南方人，梁民對於故國的思念正如越鳥之於南方一般。此處的越鳥思念不只是「家鄉」而是「南方」，越鳥和確切的地理方位因而結合在一起。而曹植〈朔風詩〉「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左思〈悼離贈妹詩〉二首「越鳥巢南，胡馬仰北」等，也持續將越鳥放置在南北對舉的框架中，具體的地理指涉相當明確。胡馬即使脫離原詩架構借代為胡人、北方人，仍與地理方位密切相關，如陸機〈從軍行〉「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以胡越南北對舉、蕭綱〈隴西行〉「邊秋胡馬肥，雲中驚寇入」以胡馬肥壯暗示北人軍容壯盛。由此可見。三個新詞組僅有南枝能跳脫南北結構、獨立衍生語義，可見看似「偶然」、「隨機」的詞彙化成果，其實源於詩人有意揀擇語詞，積累成共通的衍生義，因而形成詩歌中的新詞。

作為對句中唯一的成辭，「北風」同樣受到結構的限制。因為北風在六朝至唐代詩歌之中僅在南北對舉的架構下才能表達「家鄉」此一衍生義。北風一詞早在《詩經·邶風》中便已出現：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²⁸ 唐·李百藥：《北齊書·帝紀第四·文宣》（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60。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²⁹

全詩以「北風其涼」、「北風其喙」為前兩章各自的首句，小序認為此詩為「刺虐」之用，描寫衛國施政不當，百姓因而相偕而去的場景。³⁰ 北風具象化了失敗的執政，藉由其涼、其喙的特性暗示了百姓所處的惡劣環境。

《詩經》以下，北風所呈現的詩歌意象可分為兩類，一種是延續《詩經》而來，寒冷寂靜的冬季描寫，更進一步引申成嚴峻艱苦的現實環境，如東漢蔡文姬的〈悲憤詩〉以「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描寫異族生活之艱辛、《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曹操〈苦寒行〉「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唐代王昌齡〈秋山寄陳讜言〉「北風何蕭蕭，茲夕露為霜」、孟浩然〈早寒江上有懷〉「木落雁南度，北風江上寒」都是以寒冷的北風暗指險惡的環境。「北風」的另外一重含義則沿用〈行行重行行〉與南方對舉、作為家鄉意象，如〈河上歌〉「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南朝梁沈滿願〈王昭君嘆〉「情寄南雲反，思逐北風還」，到了唐代張說〈南中別陳七李十〉「畫鷁愁南海，離駒思北風」仍然運用這套南北相對的表達形式，描寫異鄉人／物思慕、親近一個靠近家鄉所在方位的自然現象（如風、日、雲、海），以此傳達思鄉之情。北風在六朝至唐代詩歌中逐漸生成的雙重意涵，凸顯出北風僅在原詩架構之下才能代指家鄉，它獨立衍生成的詞義則是嚴峻的環境，憑依的是《詩經·邶風》所賦予的意象。可見當詩人從〈行行重行行〉一詩取用成辭時，北風和胡馬、越鳥一樣都需要與實際的地理方位密切聯繫。

以〈河上歌〉作為對照，更可以看出南枝在詩歌運用時的特殊性。〈河上歌〉以和〈行行重行行〉同樣的句型呈現北風和日光對比，顯示出南北對舉的結構不

²⁹ 同註 19，頁 11。

³⁰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同前註。

一定要用北風和南枝來對照，可見選用南枝而非日光的其他詩作是詩人有意的選擇：

同病相憐，同憂相掄。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

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³¹

「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同樣展示了異地動物心戀故土的架構，但越鳥卻不是在南方的枝頭上棲息，而是向太陽所在的位置聚集。換言之，〈行行重行行〉從先秦歌謠延續胡馬與北風、越鳥三個元素，南枝卻是詩人獨創的語詞。

「望北風而立」與「向日而熙」字數和詞性都不相對，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卻是早期五言詩少見的工整對偶句。³² 趙敏俐認為「為了與北風這個專有名詞相對，詩人可以隨手牽來一個『南』字與『枝』組成一個臨時性的新詞語『南枝』」。³³ 句式的對偶能與中古漢語注重駢儷、五言詩多用對偶的觀察互為印證，因此在《古詩十九首》之前，各類典籍都沒有「南枝」一詞，而在《古詩十九首》之後，南枝則延續著〈行行重行行〉賦予它的相關意象持續被運用和詮釋著。然而南枝的出現是不是「臨時性新詞語」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南與北的

³¹ 〈河上歌〉出於《吳越春秋》，〈闔閭內傳·闔閭元年〉記載楚白喜奔吳，吳大夫被離問伍子胥對此事看法，「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明代馮惟訥《古詩紀》著錄此詩，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以胡馬望北風而立以下非歌詩正文不錄，然今本《吳越春秋》驚翔之鳥以下亦非歌詩正文，明以前如何認識〈河上歌〉全詩或有模稜之處，但可以確定的是即使不是詩歌作品，先秦時已有將胡馬、北風、越鳥、陽光四者比附的概念。參漢·趙擘：《吳越春秋》（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頁26-2；明·馮惟訥：《古詩紀》（欽定四庫全書本），頁82；同註1，頁28。

³² 葛曉音於《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一書中，討論對偶等修辭如何逐漸發展，在五言詩中被運用，進而闡述修辭在詩歌體式的發展中所起的推動作用，同註22，頁275-299。

³³ 同註27，頁92。

對仗固然較為直觀，而用「枝」來與「風」相對則更應該考慮鳥類習於棲息樹枝上的特性，可見所謂的「詩人隨手牽來」背後其實有生活體驗的影響。從這一點來看，南枝的語詞結構從生成之始就考慮到形式和譬喻的雙重需求。而經由對偶句形成詞組、並逐漸成為詩歌中具有衍生詞義的新語詞，南枝並非孤例。如「掩映」一詞，也是由謝莊〈和元日雪花應詔詩〉「掩映順雲懸，搖裔從風掃」一組對偶句之後才逐漸成詞的。

越鷺熙日的句子證成南枝是詩人為求對偶而組合的新語詞，同時也說明了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這樣的意象並不一定要解讀為思鄉，此類詮釋乃是詩人有意的選擇。〈河上歌〉「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鷺向日而熙」意為「同類相應、同類相求」。雖然胡馬、越鷺之所以望北風、向日是因為親近故鄉的緣故，然據《吳越春秋》記載，伍子胥用此詩解釋他如何看待出奔於吳的楚人。用意在於解釋「同病相憐」的悲憫，而非以此闡發思鄉之情。南朝梁蕭統的〈飲馬長城窟行〉「胡馬愛北風，越燕見日喜」雖然依舊沿用胡馬、北風、越鳥和陽光，以此談論的卻是「行客行路遙，故鄉日迢迢」的羈旅之情，回應的是〈行行重行行〉以降的思鄉意象。沿用南北對舉的架構並開創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尚有梁范雲〈贈沈左衛詩〉「越鳥憎北樹，胡馬畏南風」顛覆了原詩親近家鄉的方位對比，用負面描述形容動物厭憎異地風土的心情；陳江總〈遇長安使寄裴尚書詩〉改動原詩藉動物思戀故土暗指遊子不返的絕情，以「北風尚嘶馬，南冠獨不歸」一組對句更精練、明確地召喚遊子。由此可見，即使沿用了南北對舉的框架、選擇了以思鄉而非同類相聚進行解讀，詩人仍然可以化用出許多新的修辭手法或意象。而那是什麼原因使得某些詩人沒有翻新追奇、尋求創意的突破，而選擇沿用成辭抒情達意呢？既然選用「成辭」，或許應該從南枝的字面義加以考量。

除了越鷺熙日／越鳥巢南兩種表現方式的對照，南枝的特殊性還展現在文本類型上。以北風為例，它不僅大量出現在詩歌中，《詩經》、《左傳》、《爾

雅》等經書，從《後漢書》到舊《五代史》等史書、《穆天子傳》、《世說新語》、《敦煌變文》等小說，醫書如《黃帝內經》、佛書如《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都使用了北風一詞，其普及性遍及各文類。相較於此，「南枝」在〈行行重行行〉才第一次出現，之後也主要用於文學作品中。南枝在五言詩歌的發展前文已有述及，辭賦則是另一種多次使用南枝的文體。雖然唐代詩人運用南枝的方式較之六朝更為豐富多元（見第二、四節），但這些新思妙想卻於六朝辭賦便可見端倪，懷鄉、傷逝、音樂、詠物等不同主題的辭賦都用了南枝一詞，或是如前引陸氏兄弟〈懷土賦〉、〈愁霖賦〉、晉劉涑母孫氏〈悼艱賦〉「顧南枝以永哀，向北風以飲泣」化用舊典、或是如晉夏侯湛〈夜聽笳賦〉「越鳥戀乎南枝，胡馬懷夫朔風」照搬格套、或是如繁欽〈桑賦〉「陽蜩鳴其南枝，寒蟬噪其北陰」以新的對偶組合指涉方位。³⁴ 可見在詩歌新語詞的生成中，不但需要回應詩歌史本身的發展脈絡，跨文類的交互影響也促使新詞的意涵更為豐富。

雖然辭賦主題多樣化，但南枝在詞句中的效果仍與詩歌近似，如果不是借其典故，就是用以對偶。詩人在辭賦上的發揮雖然未必凸顯南枝作為家鄉的衍生語義，卻證明了南枝的字詞結構宜於對偶，因而多被創作者取用的現象，也越發凸顯了南枝在文學創作中逐漸生成新語詞的特殊性。南枝成為專用的詩歌語詞並非特例，田曉菲論及「浪漫化的南方」時指出：「自東晉以來，『江左』一詞也很常用，不過，在四世紀到六世紀之間，『江左』不見於詩，只見於文，詩歌通常不取『江左』而取『江南』。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江南』一詞是在梁代詩歌中才開始頻頻出現的，而梁朝正是浪漫化『南方』形象逐漸成形時。」³⁵ 可見詩人對於同義詞的使用仍有細緻的區分，而「南」所指涉的浪漫化與文學性在「南枝」和「江南」兩個多用於詩歌的語詞上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詩人偏愛

³⁴ 魏·繁欽：〈桑賦〉，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木部上·桑》，卷 88，同註 2，頁 1523。

³⁵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46。

「巢南枝」的意象，致使南枝能夠跳脫南北對舉的結構單獨衍義，與「南」、「枝」所觸發的感覺經驗密不可分。

四、「南」與「枝」：譬喻生成與詩歌新語詞

詩人偏好南枝的家鄉意義，固然有典故和詩歌體式上的考量，但從「南枝」一詞生成之始，詩人就考慮到形式和譬喻的雙重意義。如果詩人以南枝與北風相對是因為考慮到鳥類棲息於樹枝的特性，那麼南枝持續地被詩人用以借指家鄉或許也與人們的生命經驗相關。從李嶠的〈鷓鴣〉可以看見，南枝除了用以直指家鄉外，也能表達溫暖、喜悅和眷戀之情：

可憐鷓鴣飛，飛向樹南枝。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
露滋不堪棲，使我常夜啼。願逢雲中鶴，銜我向寥廓。
願作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何不舊巢住，枝弱不得去。
何意道苦辛，客子常畏人。（卷57）

詩中的「南枝」體驗了日照溫暖的特性，讓鷓鴣想要飛往此處居住。看起來此處的南枝與家鄉沒有關聯，但鷓鴣其實就是詩人異居他鄉的自況，一鳥、一人、一枝、一鄉相互對應。鷓鴣居住在北枝上，因險惡的環境夜夜哀啼卻無法飛向溫暖的南枝，其原因就與客子處境艱辛卻不能返鄉一樣，是因為「枝弱不得去」。以客子與鷓鴣對應，即便南枝在此處所使用的詞義是向南樹枝之意，南枝借代家鄉的意圖卻很明確。而李嶠〈鷓鴣〉對於南枝溫暖、向陽特性的描繪，回應了異鄉遊子對家鄉的印象與感觸，或許說明了南枝在〈行行重行行〉之後，能取代北風獨佔家鄉意象的原因。

南方溫暖的特性，也散見於其他詩作中。唐詩多用南北對舉呈現北方之凜冽與南方之溫暖。比如劉長卿〈奉酬辛大夫喜湖南臘月連日降雪見示之作〉「柳絮三冬先北地，梅花一夜遍南枝」、白居易〈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北渚寒留雁，南枝暖待鶯」，劉詩更讓一夜開滿南枝的梅花呈現出南方的美好與希望。南方的溫暖意象還體現在唐代許多詠嘆花開的詩作中，如李嶠〈梅〉「大庾斂寒光，南枝獨早芳」、韓偓〈早玩雪梅有懷親屬〉「北陸侯纔變，南枝花已開」、〈冬至夜作〉「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都是將南枝早發花作為南方日暖的象徵，以及物次節候改異的徵兆。而詩作的其他句子則以梅香遍地、草綠雲開、寒川破冰、揚帆出海等意象，共同營造出一個生機蓬勃、美麗繽紛的春季。從唐代詩人的作品可以發現，詩人對於物類日益精緻的描寫生長出南枝意象的豐富內蘊。原詩無特定指涉的越鳥、南枝，至六朝則生發出「暮雀」、「雙燕」上南枝、「鶴鳥」飛離南枝的變化，不同的禽鳥映照的是詩人不同的情緒感受。³⁶ 暮色中歸巢的倦鳥反襯期盼落空的思婦、一對雙飛燕嬉戲的場景寄託詩人永結同心的想望、鶴鳥離巢則映襯詩人早起向學的志氣。也讓南枝成為或是閨怨別愁、或是男女歡情、或是時光推移的承載。到了唐代，南枝借指的多為桃樹或梅花，一是春日將臨的象徵、一是凜冬嬌點的指涉，品種的選擇和物候轉換的聯繫頗為明確。而唐詩中與南枝相繫的禽鳥則以鷓鴣為大宗，鷓鴣是唐宋詩詞常見的意象，³⁷ 「行不得也哥哥」的擬聲喚起思念遠人、別情離愁的創作主題。而漢代楊孚《交州異物志》「鳥像雌雄，名鷓鴣，其志懷南，不思北徂」的敘述，更讓鷓鴣與南方產生密切的關聯。³⁸ 由此可見，

³⁶ 同註 1，頁 1767、1915、2461。

³⁷ 張傳剛：〈唐宋詩詞中鷓鴣意象的運用及其意蘊〉，《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1 年 8 期（2011 年 8 月），頁 95-97。

³⁸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禽鳥二·鷓鴣·飛南向》（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461，頁 3778。

從《古詩十九首》、六朝詩作再到唐詩，南枝予人溫暖、如家鄉一般的感受是經由詩人一代又一代切磋雕琢，借重詩歌中其他元素共同營構而成的。

這些詩作中的南枝未必都引用〈行行重行行〉的典故，但詩人對南方樹枝的描寫足以驗證唐人的南土印象是溫暖、美好而充滿希望。南方較為溫暖的氣候，影響了植物能夠較早開花的生長特徵，這兩種具體事實影響了詩人的心情感受。如劉長卿的詩作〈廨中見桃花南枝已開，北枝未發，因寄杜副端〉將「南枝已開」、「北枝未發」對比，以「年光不可待，空羨向南枝」表達南枝能夠較早體驗春光、花開（有所成果）所引發的羨慕之情。³⁹ 而早春、早花的現象往往致使欣羨喜悅之情，比如「喜」湖南臘月、「空羨」向南枝等。連日寒冬中感受到陽光、看見陽光所熏暖的新發花朵，所引發的期待愉悅可以想見。

藉由李嶠〈鷓鴣〉一詩對於異地霜露滋、家鄉日照暖的慨嘆，也可以得知南方所提供的溫暖與喜悅之情正合乎異地遊子對家鄉的嚮往。這樣的嚮往已經不同於〈行行重行行〉裡僅是同類相應的南北對舉，而是南方意象的特性合乎時人對家鄉的企盼和想望。以前引〈鷓鴣〉一詩為例，這首詩在《全唐詩》繫於李嶠和韋應物的名下。李嶠是高宗的丞相，趙州贊皇（今之河北省）人，出身趙郡李氏，世代為河北著姓。韋應物則生在京兆杜陵（今之西安），祖上是關中望族。⁴⁰ 不論〈鷓鴣〉的作者是誰，都是世代生長在北地的北方人，如果要借用〈行行重行行〉的意象表述懷鄉，「北風—胡馬」的組合顯然較為切合他們的生命經驗。但

³⁹ 唐·劉長卿撰，儲仲君箋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128。

⁴⁰ 《舊唐書》李嶠傳記稱：「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內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為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參後晉·劉昫等著：《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94，〈李嶠列傳〉第四十四，頁2992。韋應物於兩《唐書》無傳，《全唐文》稱其「應物，京兆長安人」，參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375，同註18，頁3809。傅璇琮考證其家世，稱其門第顯赫、出身關中、世代為宦，參傅璇琮：〈韋應物繫年考證〉，《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72-275。

〈鷓鴣〉的作者卻選擇了一心思南的鷓鴣為代言，運用一個不符合個人經驗的語詞，將溫暖的南枝視為家鄉的代表。可見唐代詩歌中不論作者本身是南人或北人，都傾向於以南土風光凸顯家鄉的意象。而詩人對於南方的印象不僅可從唐詩獲得線索，更應該追溯先秦以降中國文學傳統上對於南方層疊附加的意象。因為詩人對南方的想像不只是個人的生命經驗，也是文化與歷史記憶共同建構而成的。田曉菲認為，南方在《詩》《騷》的時代並未與北方對立，而是相對於中原的文化、地理概念；六朝以後，南方才成為了漢文化中心，與北方相對、彼此競爭文化與政治的正統性。⁴¹ 由此可知，人們對於南方意象的想像不僅隨時代有所差異，除了自然與身體感知外，也受到政治社會情況的影響。

鄭毓瑜認為生活與風土之間具有互動關係，人類透過語言陳述情感時會不自覺帶引出對風土和場所的印象，而那是人類歷史記憶所共構的。⁴² 她以《詩經》「山有……隰有……」、「南有……」等套語為例，說明詩人在運用這些句子起興時，其實具有試圖陳述的情感需求。如「山有……隰有……」藉由山、隰與草木之間的相輔相成，傳達君臣之間相處得宜的期待。而「南有……」則以南方水土膏澤、潤澤的特性引申出德披天下的「美善想望」。鄭文的研究對象是詩經的套語，套語經由不同詩作的反覆運用疊加上情感與經驗的意涵，而不同時代的詩人重複使用相同的語詞，其進程背後應也有近似的情感驅力。她引用段義孚的說法，說明人類透過五官知覺強化了對空間的認識和感受，而具有生命感的空間意識能夠透過知覺或情感經驗，積累成具有歷史脈絡的文化傳統。更進一步地，她指出詩歌中的情感狀態不只是詩人個人的經驗，感受的源頭「可能出自人與外在環境的接觸、互動所形成的意義；亦即可能是這地域風土的特性。」⁴³

⁴¹ 同註 35，頁 246。

⁴² 鄭毓瑜：〈重複短語與風土譬喻——從詩經「山有……隰有……」、「南有……」重複短語談起〉，《清華學報》第 39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7。

⁴³ 同前註，頁 6-23。

《詩經》套語的研究能夠證成南方豐潤、多植被的地理印象，而六朝以降對於「南」的想像又是如何？景遐東引述唐人詩作、遊記，總結成「山川秀美、氣候溫暖、水域眾多」的地理觀察，並因多水、濕潤、植被豐富、盛產玉器的特性，形成溫柔細膩、清新婉麗的審美風格。⁴⁴ 景氏所舉文例雖以唐代為主，但考諸六朝記載，溫暖濕潤多綠的特性是一脈相承的。如左思〈吳都賦〉「樹呂青槐，互呂綠水。玄蔭耽耽，清流亶亶」、顧愷之詠會稽之美稱「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⁴⁵ 除了氣候與身體感之外，南方印象也受到歷史和政治的影響。王文進注意到南朝詩人多寫「洛陽道」、「長安道」為題的詩作，這並非表示南人對北方的興趣和理解，而是藉由時空的錯置將舊都長安、洛陽與今之首都建康合而為一。而南朝詩人筆下名為長安實為建康的南方大城則呈現出歌舞昇平的都會風情。⁴⁶ 唐代政治重心集中在北方，南方在文人心中的形象又有所不同。廖宜方指出唐代「南方」具有山水隱逸的形象，如中宗韋后之父韋玄貞讀了「高人逸士傳」後興起遠遊江南名山的念頭。逸士和江南之所以產生關聯是因為居於江南的六朝人喜撰、喜讀《高士傳》；受到高度評價的北朝酈道元《水經注》則大量抄綴自南朝地理志。而山水文學更是自王粲在襄陽寫成〈登樓賦〉而萌發，至南朝高度發展而成的。而相較於北朝「政教嚴切」因而退休困難、隱逸更無可能的風氣，南方水土柔和、山川蜿蜒、水氣氤氳的自然景觀，隱士高人自在悠遊於叢山綠水間的文化印象更為強烈。⁴⁷

⁴⁴ 景遐東：《江南文化與唐代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38-72。

⁴⁵ 左思〈吳都賦〉參清·嚴可均校輯：《全晉文》卷167，同註13，頁1884；顧愷之詠會稽參南朝宋·劉義慶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同註14，頁143。

⁴⁶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163-165。

⁴⁷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頁412-414。

從先秦到唐代，南方的意象不斷被層層堆疊。自然環境的溫暖濕潤在《詩經》套語裡引申為帝王膏澤，到了六朝時切身的居住經驗則使南方成為令人嚮往的安居之地。受到歷史與政治的影響，南朝文人雖然多寫洛陽、長安，但書寫景象卻來自居於建康的親身經驗，間接刻劃出平穩豐足的金陵城日常。唐代政治重心北遷，南方反而因為自然環境、文學創作和歷史事實共同形塑出山水隱逸形象，成為士人心中可以放逸遁居的高尚樂土。如此一來，不論南人、北人在詩歌創作上都以南枝借指家鄉的傾向，不只是借用〈行行重行行〉越鳥慕南的成辭，也是南方歷時性地疊加上溫暖、濕潤、希望、宜人、隱逸、自然、不慕榮利等種種意象，致使詩人產生歸返的嚮往。

除了「南」方形象外，樹「枝」意象也對詩人採用南枝而非北風借指家鄉的意圖產生影響。段義孚論述「地方的親切經驗」時引用了一齣話劇，說明家與人之間的關係：

Hanna：……我思想中的家是一所在，兩人能彼此好好地作巢，休息、生活，指感情化方面言，這解釋對你有沒有產生意義？

Shannon：是的，完全明白，但是，當一鳥建築來休息和生活時，不會建在一棵倒下的枯樹上。⁴⁸

劇作家自然地將人與家的關係比附成樹與鳥。對此段義孚的關注焦點在於永久性，他認為「永久是地方的意義上的重要元素。物件和物體的耐久性依賴人的生物性弱點和情緒上之改變。而無依賴則不持久」。⁴⁹ 除了樹就相當於鳥類的

⁴⁸ (美)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頁132。

⁴⁹ 同前註，頁132。

家之外，「不會建在枯樹上」的台詞點明了人對家的依賴性在於永久，而樹的永久性使它可以擔負家鄉的意義和借指。

樹木與永久性的強烈連結並非僅是劇作家的個人體驗。段義孚認為人對於地方的「親切經驗」表達有一定的難度，因為這種經驗不完全是個人的，親切經驗的「激動和特殊」正是文學作品的主題，需要找尋旁人能夠共感的「適當分享環境」。⁵⁰ 從楊佩瑩對樹木譬喻的分析可知「樹木—安居」之間的關連在六朝詩歌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她認為樹木搭建的譬喻可以分為三大類：安居、生命力和芬芳之樹。安居的譬喻路徑是「古者構木為巢，樹木既為人居之所，亦為禽鳥所巢、獸類安居之處。藉由這個安居意識所獲得的拓展，更及於宗教之境與仙境」的延伸。⁵¹ 她以「樹木」作為大分類，分析詩歌中的相關意象，並沒有區分樹、木、枝等不同語詞的差別，但從前人研究可知語詞之間其實潛藏了詩人細膩的不同指涉。林庚〈說木葉〉辨析了樹、木、葉的不同，因為木讓人聯想起樹幹和暗沈的顏色，因此多用以暗示秋季落葉的景象；而樹所傳達的形象則是枝繁葉茂，與「葉」字太相似，因此樹葉成為一個累贅的詞語，在詩歌中較少使用。⁵² 林庚的研究雖然以部分代替全體地將「葉」視為「樹」，沒有觸及葉、枝、根等不同部位在創作意涵上的差異，但卻示範了大類別下小差異之間的千里之別，更重要的是這些區別都與人們的生活經驗有關。由此反觀楊佩瑩文中所用以佐證安居乃至思鄉意涵的作品，會發現此一主題下的詩歌多運用「枝」而非樹或木。思鄉與樹枝的連接，或與樹枝源於根株、接地氣而生的特性相關。如

⁵⁰ 段義孚認為「然而，每一種文化有其獨特的親切符號，廣受其文化人群之認可。……個人的附件不一定就不可以有別人分享，但最重要的是每一分享的經驗必須在適當的分享環境中……。」同前註，頁 140。

⁵¹ 楊佩瑩：《六朝詩「傷春」的連類譬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鄭毓瑜先生指導，2013 年），頁 188。

⁵² 林庚：〈說「木葉」——〈九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唐詩綜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81-194。

漢樂府〈豫章行〉寫豫章山上的白楊遭逢大匠砍伐，因而根株斷絕、枝葉相捐。末二句以「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將異鄉旅思託於離根樹木之上。⁵³《樂府解題》指出陸機、謝靈運的同題作都援用原詩的根枝情懷寫離別之苦。⁵⁴因此，「枝」不但因其作為樹木的一個部位而可為安居的象徵，相較於根、木(莖)，枝生於根株的特性可以作為留於原鄉的根株和羈旅他方的遊子之間的中介，成為異鄉客心中家鄉的象徵。

六朝詩人的譬喻手法顯示出「樹枝」引申到「安居」、「所生」的意象具有普及性，已然形成以南枝比擬家鄉的適當分享環境。而唐代詩歌也在在凸顯了樹枝作為居所的連結。從前引〈鷓鴣〉一詩可知，樹枝是一個可供棲息的場所，所以鷓鴣鳥在在南枝不可棲息後，就飛到了寒冷的北枝。即使霜露寒冷，也是一個勉強可以休息的暫棲地。此外如清江〈春遊司直城西鷓鴣溪別業〉「越客初投分，南枝得寄棲」、朱灣〈送陳偃賦得白鳥翔翠微〉「正好南枝住，翩翩何所歸」，也以寄棲、停住南枝來顯現出樹枝可供停留暫止的特性。樹木在這些作品中呈現出一種生長在原地不會移動、隨時可見、可回歸的地點。如前引駱賓王〈望鄉夕泛〉「今夜南枝鵲，應無繞樹難」，鵲鳥繞樹是因為樹木是固定不變的地點，鵲鳥因而能夠圍繞著它，表達內心思鄉之情。除了不會移動之外，枝條還是一個可以攀折、持贈的具體事物，如張籍〈薊北旅思〉「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便是以折盡南枝來表達自己心戀故土的心情。徐鉉〈送王四十五歸東都〉更是典型的例子：

海內兵方起，離筵淚易垂。憐君負米去，惜此落花時。
想憶看來信，相寬指後期。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卷754）

⁵³ 感謝匿名審查人引〈豫章行〉提醒「所生」與「枝」之間的關聯性。

⁵⁴ 同註1，頁263。

送別即將遠行的友人時，攀折向南枝頭的柳條贈與對方，既是戀戀不捨地「相留」之意，同時也是以一截能用以召喚鄉思的樹枝，撫慰異鄉遊子思戀故土之情，又藉此叮嚀對方不要忘記家鄉與鄉人的期盼。

樹枝可供停住的特性，相較倏忽來去的北風，更合乎家鄉使人意圖回返、停住、永遠回頭張望的意象。而可供攀折的枝條，則是可觸碰、可見的具體事物，作為一個勾連相思的替代物品，在書寫上，足以化抽象的思鄉之情為具體的向南樹枝，這與北風吹拂、飄移的特性正好相反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行行重行行〉中，南枝和北風同樣指涉家鄉，六朝到唐代的詩歌創作中卻只有南枝衍生出家鄉的新語義。

五、結論

追求新變是文學演進的一大動力，詩歌創作中既有詞彙與新詞語更是不斷交互作用，共同建構出豐美的意象、活潑的節奏。過去的研究成果多集中於為描述新事物而產生的新語詞如何反應新舊時代的拉鋸，以及舊詩體與新語詞的互動。本文則試圖關注偶然形成的語詞逐漸形成衍生義，因而成為詩歌常用詞的生成過程。語言學上將這樣的現象稱為「詞彙化」，但相關研究關注的是「成詞」的過程和語義變化，然而究竟為何某些語詞能夠持續被揀擇、被運用？其原因是這篇文章試圖立基於前行研究所進一步追問的論題。分析六朝到唐代詩歌中「南枝」一詞的運用情況，不僅能探求詩歌新語詞生成的動因，也能夠藉由對動因的探索理解新語詞對詩歌發展的影響。

「南枝」最早出現在於《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這一組對偶句以胡馬、北風、越鳥、南枝兩兩相對呈現出南北對舉結構，藉此傳達身在異地的動物戀慕家鄉的心情。其中北風是《詩經·北風》開始使用

的語詞，其餘三者則是首度被結合的雙音詞組。六朝以後僅有南枝在詩人的運用下逐漸形成「家鄉」的衍生義，胡馬和越鳥則始終不能脫離原詩的結構。而在原詩中與南枝一同分享家鄉意象的北風，在此後的詩作也僅在南北對比的架構下用以借指家鄉，其衍生義則是延續《詩經》以來暗指寒冷、嚴峻的艱困環境。這顯示出南枝的印象回應了詩人對於家鄉的感知和期待，看似偶然的成詞和衍義過程其實受到典故、形式和譬喻三個因素的影響。

南枝雖然在〈行行重行行〉中即作為家鄉的借代，但六朝到唐代詩作跳脫制式南北對舉結構，更靈活地運用南枝一詞。詩人將南枝視為指涉原詩的「成辭」，以較少的字涵融更豐富的意蘊，而典故一再被召喚也證成了家鄉語義的接受度；此外，南枝雙音合成詞的結構不但適合置入五言詩二一二的句式節奏，更宜於對偶，因此切合了五言詩發展過程中藉修辭連接單行散句的嘗試。在南枝作為家鄉的前提下，詩人以描寫樹枝的枝葉、對著實體的樹木落淚、繞步等行為，表達對家鄉的眷戀之情。這種書寫方式顯示出南枝作為家鄉的衍生義被廣為接受，因而足以讓詩人進一步使用修辭技巧：以南枝字面意義來表達對家鄉的情懷。如果南枝作為家鄉的意義不是預設讀者都能接受的基本概念，那麼詩人突然無視於全詩結構或個人出生地，對著向南枝頭揮淚思鄉就有些突兀了。

而從詩人描繪南枝的修辭技巧可以發現，詩人強調南方的溫暖，以及因為溫暖產生的早花，溫暖與希望讓詩人感發一種喜悅和眷戀、渴慕之情。藉由前人對於「南方」和「樹木」的研究，追溯先秦到唐代如何漸次對這兩個概念疊加豐富的意象。於是發現「南」與「枝」的語義受到自然環境、身體感知、歷史文化和政治情境的影響，當詩人揀選南枝一詞，所要回應的不僅是〈行行重行行〉的詩歌成辭，也是溫暖潤澤的感受、山水蔥蘢的美景、隱逸高人的脫俗、永遠能夠回歸和停駐棲息的安全感，以及悠遊於四者之間的不慕榮利、身心舒泰的自己。

通過對六朝到唐代南枝作為詩歌新語詞運用情況的爬梳，從典故用事、詩歌體式、譬喻生成等三個面向試圖理解南枝為詩人持續運用並能生成衍生義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藉由討論語詞生成的影響要素，發現一個新語詞的生成居然關涉了詩歌體式和文學意象的議題：包括共識性的意象如何疊加在成辭上，並形成新的典故；詩歌句式和修辭彼此影響、不斷更新的動態過程；以及譬喻意涵如何隨著詩人慧心和歷史、政治的互動不斷增生。以典故、形式和譬喻作為討論詩歌新語詞生成的三個切入角度，不僅是歸納唐前詩歌對南枝一詞的運用情況所獲得的研究取徑，也是因為此三者正是漢魏六朝以降的重要詩學論題。⁵⁵ 由此可見，詩歌新語詞的討論不僅是「詞彙化」的問題，更是詩歌史研究的關鍵。

⁵⁵ 用事、體式與譬喻在六朝文學研究的重要性參前引蔡英俊：〈「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葛曉音：〈探索詩歌分體研究的新思路（代緒論）〉，同註 22，頁 1-17；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躍譯：〈唐詩的語義、隱喻和典故〉，《唐詩三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頁 137-217。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斷句十三經經文》，臺北：開明書局，1991年。
- 漢·趙曄：《吳越春秋》，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南朝宋·劉義慶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4年。
-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91年。
- 唐·李百藥：《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唐·李延壽：《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唐·劉長卿撰，儲仲君注，《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明·馮惟訥《古詩紀》，欽定四庫全書本。
- 清·曹寅、彭定求等編，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全唐詩（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二、近人論著

1. 專書

- 王文進：《南朝山水與長城想像》，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 王雲路：《中古漢語詞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田曉菲：《烽火與流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
- 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躍譯：《唐詩三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景遐東：《江南文化與唐代文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葛曉音：《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董秀芳：《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與發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
-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年。
- 蔣紹愚：《唐詩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年。
- （美）段義孚（Yi-fu Tuan）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年。

2. 單篇論文

- 周尚義：〈閒人、閒居與閒味——白居易閒適詩語詞的文化解讀〉，《湖南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5期，2006年9月，頁33-36。
- 周俊勛、朱慶之：〈中古漢語詞義研究札記〉，《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2卷第4期，2011年7月，頁14-17。
- 林文月：〈潘岳陸機詩的南方意識〉，《臺大中文學報》1992年第5期，1992年6月，頁18。

- 林庚：〈說「木葉」——〈九歌〉：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唐詩綜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81-194。
- 張傳剛：〈唐宋詩詞中鷓鴣意象的運用及其意蘊〉，《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2011年8期，2011年8月，頁95-97。
- 傅璇琮：〈韋應物繫年考證〉，《唐代詩人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69-325。
- 楊玉成：〈詩與時：陶詩與中古時間詞語〉，《東華漢學》2010年第11期，2010年6月，頁29-121。
- 趙敏俐：〈四言詩與五言詩的句法結構與語言功能比較研究〉，《中州學刊》1996年第3期，1996年5月，頁87-92。
- 趙曉馳：〈王維詩歌顏色詞義研究〉，《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2007年10月，頁76-80。
- 蔡英俊：〈「擬古」與「用事」：試論六朝文學現象中「經驗」的借代與解釋〉，李豐楙主編：《文學、文化與世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67-96。
- 蔣英豪：〈日本雜事詩與近代漢語新詞〉，《漢學研究》第22卷第1期，2004年6月，頁299-323。
- _____：〈梁啟超與近代漢語新詞〉，《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13卷44期，2004年，頁379-404。
- 鄭毓瑜：〈重複短語與風土譬喻——從詩經「山有……隰有……」、「南有……」重複短語談起〉，《清華學報》第39卷第1期，2009年3月，頁1-29。
DOI:10.6503/THJCS.2009.39(1).01。

_____：〈舊詩語的地理尺度——以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的典故運用為例〉，
《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年，
頁 251-292。

3. 學位論文

朱先敏：《抒情與節奏——魏晉五言詩重言與聯綿字情態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鄭毓瑜先生指導，2014年。

楊佩瑩：《六朝詩「傷春」的連類譬喻》，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鄭毓瑜先生指導，2013年。